

外贸开局回暖 逆差可谓偶然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实习记者 刘国民



海关总署3月8日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前2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3.89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0.6%。其中,出口2.09万亿元,增长11%;进口1.8万亿元,增长34.2%。单就2月份而言,我国进出口总值1.7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9%。其中,出口8263.2亿元,增长4.2%;进口8866.8亿元,增长44.7%,贸易逆差603.6亿元。

《中国贸易报》记者从商务部网

站查阅2013年以来近5年同期进出口数据发现,2017年前2个月进出口总值创近5年新高,前2个月进出口总值的最低数据出现在2016年(3.31万亿元人民币);前2个月进口总值最低数据也出现在2016年(1.35万亿元人民币)。

“应该说,公布的全国进出口数据,印证了今年以来外贸开局明显向好的势头。”3月8日,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对我国当前外贸形势作出了上

述评价。他表示,目前进出口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改善:一是市场需求尤其是国内需求明显增加;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制成品明显快速增长;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量保持了积极发展的态势;四是市场预期和企业信心逐渐回暖。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告诉记者,今年前2个月外贸数据同比大增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去年前2个月进出口数据基数太低;二是人民币汇率因素,去年前2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在6.5至6.6附近,今年前2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8至6.9附近,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三是2016年11月1日国家提高了400多种产品的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一般3个月之后显现出来,目前正好到了显现的时候。

今年前2个月较高的进口增长率也引起广泛关注。周世俭指出,今年前2个月进口大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宗矿产资源涨价、能源涨价,中国对这些产品的进口量明显增加,国家也加大了石油储备力度,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和战略储备需求;二是国民经济在复苏增长,内需旺盛。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也证实

了这一点:前2个月,我国进口铁矿砂1.75亿吨,增加12.6%,进口均价为每吨532.1元,上涨83.7%;进口原油6578万吨,增加12.5%,进口均价为每吨2673.6元,上涨60.5%。

由于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之间传统上存在联动关系,舆论也很在意2月贸易逆差603.6亿元的具体影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德勇认为,2月份出现贸易逆差,偶然因素比较多,是短期性的,前2个月依然保持了贸易顺差,而且外汇储备也再次突破3万亿美元,2月份单月的贸易逆差对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宜过早判断。

总体来看,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贸易增长乏力,贸易摩擦频发。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频频采取反倾销手段对付中国企业。虽然周世俭认为贸易摩擦对中国外贸整体影响不大,但一旦某一项贸易摩擦发生在某一家中国企业头上,对这家企业的影响则很大。周世俭分析说,今后企业要更重视质量和售后服务,多生产高附加值、上档次、创名牌的产品,不只是以价取胜,这样多少能起到规避反倾销的作用。

保外储 稳汇率 任重道远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实习记者 王家乐

在1月跌破3万亿美元整数关口之后,外汇储备在2月“收复失地”。据中国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2月底,外汇储备余额为30051.2亿美元,环比意外增加69.2亿美元,结束了连续7个月的下降势头。而这也是自2016年6月以来的首度回升。

哪些因素决定外汇储备的余额波动?如何看待余额回升?制度改革能否减轻外储压力?《中国贸易报》记者梳理出三大看点。

外储“掉头”无需杞人忧天

如何看待中国外储“七连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示,“储备的东西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看的。外汇储备下降是正常现象,适当下降没什么不好。”

方舟世纪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贸易投资部负责人高宏民向记者透露,“实际上,外储下跌对公司的整体影响并不算大。企业经营及收入方面并未受到影响。”

谈及外汇储备回升的原因,周小川介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分析。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经济刺激计划,货币宽松,特别是数量型的货币宽松计划,形成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流入的资本稳定性较差,当一些发达经济体复苏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会回流。这就是中国外汇储备波动的经济背景。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

企稳、国内经济回暖、贸易顺差和外汇交易规范性提升,这四个因素在外储回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今后外储的变化,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7日表示,“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增强,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会有所缓解,但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外汇储备规模可能在波动中逐步趋于稳定。”

辩证看待重返“3万亿”

针对本次外汇储备余额回升,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认为,“人民币贬值预期缓解,交易行为带动外储回升。”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形势迎来了五方面利好:一是政策层面的“奖人限出”;二是特朗普弱势美元政策下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企稳;三是境内外汇差出现倒挂,套利资金流向逆转;四是境内利率中枢上移,资本外流机会成本上升;五是近期中国经济出现企稳迹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10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说,“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有好处。”

易纲表示,在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过程中,我们遵照市场规律,人民币汇率是保持弹性的。“因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使得市场的信号得以发挥,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是我们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稳定器和调节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坦言,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会有一定影响,“如果特朗普抓住机会想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中国当然会强势反击;但如果他没那么做,情况又比较复杂,他可能把视线转到贸易、投资等其他领域,所以现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还有待观察。中国当局会等待,看局势变化再做回应。”

虽无需恐慌但仍应未雨绸缪

尽管形势好转,我们也要做到“安不忘危”、“居安思危”。近期,美联储3月加息概率提升至80%以上,外储和汇率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王有鑫指出,在预期发生大的变动时,单靠合意的外汇储备仍然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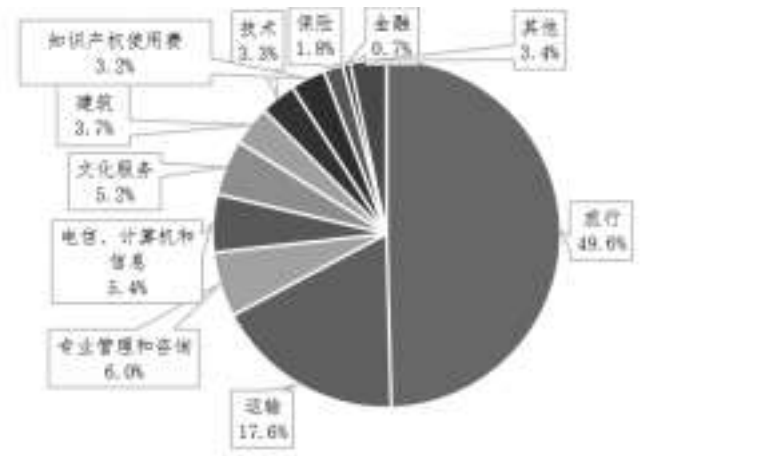
稳定市场信心。面对短期资本外流加剧的压力,我国应综合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与资本管制措施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出,增强金融部门、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打击投机套利行为,打破资本外流、外储下滑和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国内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使得外汇市场的信心有了比较高的提升,抛售人民币、购买外汇这类投机性行为就会有所遏制。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表明,我国2月进口大增44.7%,贸易逆差604亿元,说明保外储的压力仍大。再加上还有3月美国可能加息的不利因素,我国保障外储和稳定人民币汇率仍任重道远。

“二次开放” 服务贸易挑大梁

■ 本报记者 张凡



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3月2日,商务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其中提出提高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便利化水平,着力增强服务出口能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培育“中国服务”国际竞争新优势。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提及了财政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正在酝酿的服务贸易发展专项引导基金。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简称中政院)的研究报告指出,服务贸易成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是“二次开放”的重大选项。

“改革开放38年来,工业领域的市场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在推动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未来几年,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将为我

国服务业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并由此释放出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巨大红利。”著名经济学家、中政院院长迟福林如是表示。

数据显示,相比2015年,2016年,我国外贸降幅进一步收窄至0.9%,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服务贸易保持了较好发展势头,全年服务进出口额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增速达14.2%。服务贸易正成为对外贸易发展和对外开放深化的新引擎。

“当前,我国开放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将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将达20%以上,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将达10%以上,我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中的地位将显著提升。”中政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夏锋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全球产业深度分工和加速融合,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不断增强,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服务贸易将成为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的战略重点。

“我们认为,在国际国内新的背

景下,提出积极主动扩大以服务业为主的对外开放,有重要战略意义。”夏锋的判断依据是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2017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转型的时间、空间约束进一步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情况与我国经济转型大趋势,必须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开放转型,才能赢得国内发展与国际竞争的主动。

“不过,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服务贸易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夏锋用一连串的数据来佐证,“第一,服务贸易规模相对较低。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占比18%,低于2015年全球23%的平均水平。第二,服务贸易逆差较大。2016年与美国服务贸易逆差达523亿美元。第三,服务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2015年,我国金融、保险、知识产权、技术、电信、计算机和通信等新兴服务的贸易额仅占服务贸易总额的14.4%。”

除此之外,目前我国服务业市场还存在市场化程度低、对外开放程度低、服务水平低、服务价格高等因开放滞后所暴露出的短板,与经

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不变 将更重视节奏时机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实习记者 刘国民

“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外汇问题时只用了很简短的一句话。记者查阅2013年以来近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涉外汇部分的篇幅一般很短,也不单独呈现,只是在谈到金融工作时列出,今年涉外汇的部分字数则最少,但信息量很大,称得上是言简意赅。

从字面来看,政府工作报告对外汇政策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汇率市场化,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对此简单总结为:“大方向不会变”。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则对记者表示:“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的提法和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有关,和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提升了国际影响、担当了一定的国际职责有关。”

汇率市场化意味着会增加汇率的双向波动性,这对增强汇率的弹性是好事,但如果人民币遭遇过多升值或者过多贬值则会面临如何稳定汇率的考验。实际上政策层希望看到的良好局面是汇率更有弹性、实现双向波动,但也不要过度波动,而是有相对的稳定性,至少不要到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地步。

而人民币国际化其中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目前人民币实现了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还有一部分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中国的长远目标,在资本

项目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的过程中,国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压力将明显增加。如何防范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流出对金融安全的冲击,成为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接下来的中国外汇政策就是要在上述两大目标和两大考验的摩擦中相机决策,外汇管理部门会更多地用市场化机制和多种手法来稳定汇率,平衡跨境资本流动,不会再回到资本管制的时代,也不会动不动就用接近资本管制的单一手法来应对风险。应该说外汇政策的总体思路和逻辑是很清晰的,只是在具体的各个时间点推进的轻重缓急、推进的节奏会有所侧重。

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目标再次被重申,对外贸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的一系列正面影响显而易见。例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资银行在海外的人民币结算、人民币金融交易等业务有望继续扩大。

《2016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38%,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是29.36%,人民币已成为阿联酋、卡塔尔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支付的常用货币,支付占比分别达74%与60%,同比激增52%与247%。随着跨境贸易中人民币使用度的不断提高,外贸企业在做进出口业务时将会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交易不用再为汇率、结售汇操心,效率会提高,汇率波动风险和业务成本会下降。虽然余永定认为这只是一个长远趋势,但总体来看这对外贸企业是一大利好。

控制资金外流 加强离岸金融监管

■ 本报记者 陈璐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全球每年洗钱规模约介于6000亿美元至1.8万亿美元之间。以俄罗斯为例,1990—2012年,由于其国内经济政治不稳定、腐败等原因,约9600亿美元离岸资本外流到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境内注册的超过14万家公司返程在俄罗斯设立分公司。2013年3月,塞浦路斯银行业爆发金融危机,给俄罗斯金融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对比国内,自2014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也出现了持续下降和资本外流。外汇储备规模从2014年6月历史峰值3.99万亿美元下降至3万亿美元关口以下,近日又回升至3万亿美元以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离岸金融风险的监管应该加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建重庆市副主委王济光表示,“由于离岸金融信息不透明,往往会使资本流动脱离政府和税务部门监控,个别企业也会利用离岸金融进行欺诈,成为不法分子侵占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的途径和资本外逃渠道等。离岸金融导致的巨额资金流动,会对金融秩序的稳定产生强烈冲击,避税逃税、资本外逃和洗钱等行为往往与离岸金融联系紧密。”

王济光指出,我国离岸金融风险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在我国目前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模式的体制框架下,任何金融监管主体都无权对整个离岸金融业务进行统一监管。离岸金融所产生的大量游离于国内金融系统外的资本融通,使国内监管机构无法有效衡量和控制金融风险状况。

二是缺乏权威的法律规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显得十分必要。

“设立引导基金的目的是引导社会资本(包括外资)进入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与转型需要的服务业行业,如健康、教育、医疗、研发、设计等,客观上要求这些行业进一步扩大开放,降低进入门槛,并为社会资本进入与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设立基金对服务业市场开放具有促进作用。”夏锋告诉记者,中政院的研究团队对如何让服务贸易扮演好“二次开放”挑大梁的角色提供了以下建议:

第一,积极引导国外投资进入研发、设计等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为此,要积极引导国外直接投资投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鼓励国外先进企业对国内服务业投资,并融入本地传

统产业链条,积极发挥FDI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作用,实现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升级。

第二,推动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例如推动我国中医、计算机外包等优势服务业领域企业“走出去”。

第三,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新兴服务业领域,形成未来产业新优势。例如,充分利用全球科技革命带动新兴服务业重新洗牌的契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互联网+”等产业,形成未来国际竞争新优势。

记者梳理《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要点发现,规划以附件形式列出了12大类24个服务贸易发展重要领域,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各领域的发展方向 and 主要举措,使规划更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相信经过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服务”将成为中国外贸新名片。